



Foucault
in China

福柯在中国

纪念米歇尔·福柯逝世3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汪民安 主编

福柯在中国

纪念米歇尔·福柯逝世3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汪民安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柯在中国 / 汪民安主编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49-2427-0

I. ①福… II. ①汪… III. ①福柯, M. (1926-1984)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6435 号

书 名 福柯在中国

主 编 汪民安

责任编辑 谭 笑 刘淑颖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安泰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1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98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视觉性、敞视主义与生命政治	吴 琼 / 1
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福柯论治理术	汪民安 / 33
18 世纪生命政治视域下的自由主义	张 凯 / 54
福柯论治理术的源起	
——牧领制度	安 婕 / 73
基于意志的治理：伊朗革命与福柯中晚期思想的转折	姚云帆 / 98
论惩罚：福柯与涂尔干	郭 峰 / 124
从权力谱系学到伦理谱系学	
——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主体 - 权力 - 真理问题	张 旭 / 147
哲学修行与品性塑造	
——福柯的古代哲学研究	杜玉生 / 173
福柯的存在美学与审美政治	王行坤 / 192
启蒙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启蒙	
——论福柯对康德“启蒙”的质疑与改进	汤明洁 / 208
从福柯到“除忆诅咒”	
——电影的记忆治理初论	李 洋 / 236
可述与可见：福柯的艺术装置之思	赵 文 / 255
福柯的绘画研究与 20 世纪艺术史学范式的转变	鲁明军 / 272
“表征”知识型视野下的古典主义和声	何宽钊 / 291
福柯与萨德：一个镜像的研究	尉光吉 / 313
福柯“在”中国	孙士聪 / 330
《福柯在中国》编后记	345

视觉性、敞视主义与生命政治

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福柯是一个以批判社会建制和知识建制为己任的思想家，不论是前期围绕话语构成展开的“知识考古学”，还是后期围绕权力配置展示的“权力谱系学”，其实都与建制批判有关。在今天的建制研究中，福柯拥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然而，福柯的建制批判究竟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批判的政治指向究竟是什么？本文想选择视觉性作为切入点来对此类问题加以探究。

在福柯的建制思考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视觉性的隐喻。这当然不是说他对视觉建制的具体论述——这种论述在他那里其实很少是直接地和独立地进行的——而是说他对建制的结构及其运作的视觉化表述。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视觉性乃是福柯的整个建制论述的基本维度，是他进入建制批判的基本切入点，它甚至为他的建制批判提供了最基本的阐释模型。

所谓“视觉性”，字面上说，就是建立观看行为、使观看及观看的意义效果得以可能的一整套制度系统。可现如今，在视觉文化研

究中，人们还喜欢在引申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它指涉采用视觉模型建立的各种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包含有视觉隐喻或视觉化陈述的各种表征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除图像表征外，空间结构、文学叙事乃至科学陈述和社会政治话语都可能是视觉性的，都可以从视觉性的方面加以分析。荷兰著名女学者米克·巴尔（Mieke Bal）在一篇论文中界定说：

视觉性不是对传统对象的性质的定义，而是看的实践在构成对象领域的任何对象中的投入：对象的历史性，对象的社会基础，对象对于其联觉分析的开放性。视觉性是展示看的行为的可能性，而不是被看的对象的物质性。正是这一可能性决定了一件人工产品能否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甚至“纯粹的”语言对象，如文学文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作为视觉性加以有意义和有建设性的分析。^①

视觉性虽然是以显见或不显见的方式存在于各种表征实践中的视觉可能性，但它并非神秘的和不可见的，相反，它有自身的结构形态。简单地说，在所有的视觉性构成中，总包含两个基本的层次：可见与不可见；看与被看。

可见与不可见主要是针对所运作的物或对象而言的。物或对象如何被呈现和被展示，如何被诉诸视觉或使其得以被看见，这都属于可见性的运作；可同时，使对象被看见亦是使其另一些方面不可见。再者，对象的可见与不可见不只是关涉于视觉的方面，更多时候，它指的是意义呈现或意义遮蔽的方面，在视觉性的运作中，展

① 米克·巴尔：《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对象》，见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137页。

示和遮蔽总是相伴而行，一方面使不可见得以可见，另一方面又在可见中隐藏着不可见，对象就这样成为了视觉建制和视觉机器运作的锚定之地，成为了意义争执的场所。

至于看与被看，主要是就观者以及观者与对象的关系而言的，且这里面同样包含一个拓扑式的翻转。如同对象的可见与不可见是被建构的一样，主体的看与对象的被看也是被建构的，换句话说，视觉性场域不仅建构着对象的意义，而且要通过建构观看主体的位置及其观看方式来部署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进一步地，在观看的场域，不仅涉及主体的看和对象的被看，还涉及主体自身的被看和自看，用拉康的话说，涉及他者之凝视，即主体在看的同时，也在建制和对象的“目光”下被看，并且他还在用建制和对象的“目光”看自己。所以，在主体朝向外部的看中，他的被看和自看就像褶皱一样被反褶于内，甚至于他的看总是要受到这种想象的象征性被看和想象的自看的主导，他总是因为这种被看和自看而深陷看的镜城。

福柯在不同时期的写作中，例如从“癫狂史”到“医学史”再到“监狱史”；从词与物的“知识考古学”到敞视主义的“权力谱系学”再到社会治理的“生命政治”，尽管主题不断变换，理论运作的走向也在不断调整，但有一个层面总是顽强地附着在论述当中，成为他对研究对象进行语言学剥离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他的视觉化表述。尤其在对各种建制的“无惧的言说”中，他总是要嵌入视觉性的论述结构，或是把建制的运作视觉化，对他而言，建制的目光首要地就是视觉的权力运作，或者建制的权力运作首要地是通过引申或隐喻意义上的视觉性来实现的。

但另一方面，福柯的视觉化表述属于一种反视觉话语，他运用视觉模型去揭示建制的运作机制不是为了强化视觉的中心化，而是为了在视觉中心化的固有情境中来揭示视觉性对维系建制运作的重

要性，是为了利用建制中的视觉体制来松动、颠覆和瓦解既定的视觉秩序和视觉中心，就像马丁·杰伊所说，那其实是一种“沮丧的眼神”（downcast eyes），是在视觉性中实施的对视觉的“诋毁”。^①

再有，在福柯对于建制的视觉化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道目光：现代性的目光。现代性的主题几乎贯穿于福柯的所有著作，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可从他选取研究对象时的历史断点中看到：“癫狂史”“医学史”“监狱史”“刑罚史”“人文科学史”“社会治理史”“性史”，这一切“历史”叙述的背后都隐含有一个现代性的断代，每一个都因为现代性的到来而进入各自的“历史”转型。如果说建制是福柯的论述对象，视觉性是他的论述模型，那现代性就是他的论述目标，现代性的目光是他用来透视历史性的总体目光。

但一提到“现代性”，笼罩在它上面的话语丛林又会把我们带进概念的泥淖。在此要暂时撇开那些混杂的论述，集中到福柯的建制思考这个点上。简单地说，福柯的建制论述总是包含有一个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他总是在建制的历史场景转换中嵌入一个现代性的“知识型”，以揭示这一转换的历史性，或则用建制的隐喻性构成来叙写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所以，在他那里，建制思考和现代性批判是叠加在一起的。禁闭所、医院、监狱、博物馆、学校、工厂、兵营，等等，这些现代建制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场所，而是与现代性相关的一种机制、一种配置系统，它们有自己的结构和语法，它们都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标，且都指向一定的“生产效益”，它们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也是为现代性服务的社会机器。

也正是在这里，在建制运作和现代社会实践的叠加中，在现代

①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建制与视觉性的关联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在现代性和视觉性之间建立的历史链接。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历史展开是与社会部署即建制的视觉化关联在一起的，现代性的构成离不开视觉性的模型，离不开视觉化的建制对空间、对象、生命乃至死亡的重新配置。实际上，在福柯的视觉批判中，在他探讨建制运作的视觉模型中，现代性及与之伴随的“生命政治”才是真正的思考对象。在这个方面，不妨说，建制、视觉性和现代性三者构成了福柯的政治学或权力谱系学的“圣三位一体”，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生命治理。那么在福柯的理解中，何为建制？

在福柯晚期的思想中，有一个概念据有核心位置：dispositif。对于这个词，汉语有多种译法：部署、建制、装置、配置、机制、机器。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他使用的dispositif概念的含义和方法论功能时，福柯解释说：

我使用这个术语是力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它存在于话语、制度、建筑形式、管理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命题中——简言之，所说的和未曾说的。这些都是装置的要素。装置自身就是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系统。其次，我在这种装置中试图辨明的恰恰就是存在于这些异质要素之间的联系的本质。这样，一种特定的话语在某一时期是一种制度的程序，在另一时期则是试图证明或掩盖一种其本身保持沉默的实践的手段，或者作为对这种实践的第二手的再阐释，为其打开一个全新的合理性的场域。简言之，在这些要素之间，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非话语性的，存在一种位置迁移或功能改变的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也是千变万化。第三，我所理解的“装置”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构型，它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有其主要功能，即针对

“紧急需求”而有所回应。因而，装置具有一种主导性的策略功能。^①

归纳一下福柯的观点：装置是各异质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作用，故而装置是一个多元决定的关系体系；装置具有一种策略性的功能，它一方面要维系内部各异质要素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断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装置总是嵌在权力关系中，既要组织权力游戏，又要防止参与游戏各方的同质化；最后，知识生产、权力生产以及主体的生产毫无疑问乃是装置运作的基本目标，它们交织、叠印在装置的策略性功能中，并总是作为功能的效果而呈现。

在此尤其要注意福柯讲到的装置功能的策略性，这一引自军事学的术语旨在强调装置运作的拓扑性，强调权力分配与权力运用在装置当中的游戏性和游击性，以及装置对主体、知识和意义的生产的不确定性。福柯说：

我说过装置本质上是策略性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各种力量关系的操作，或是让它们朝某个特定方向发展，或是对它们进行阻挠，稳固它们，利用它们，等等。因此装置向来是嵌在权力游戏中的，但是它也总是和从它那里产生出来的、可又在同等程度上限制它的知识的定位联系在一起。所谓装置，就是支持各种知识且被各种知识所支持的力量关系的策略。^②

效果生产的这种策略性和商谈性表明，在建制研究中，虽然我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p.194-195.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p.196.

们总是强调建制的结构化功能，但切不可对此做单向度的理解，以为建制可以在外部单向地决定着主体的一切。实际上，主体总是建制中的主体，是建制运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主体的进入，没有主体对建制的迎合或反抗，建制就什么也不是。而建制中的主体并非恒定不变的存在，他/她是一个纽结了多重身份、多种欲望、多样可能性的东西，其在建制系统中的确切位置取决于他/她的欲望调度，取决于他/她与建制之间的力量角逐以及在此实现的力比多投注。

在福柯的理解中，建制运作的根本在于生产，它总是以一定的方式来配置对象的意义以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并通过这一配置最终实现对主体的生产。具体地说，建制生产的是对象和主体的“知识”。例如在西方古典裸体画的传统中，一方面利用神话学的主题动机、学院绘画的技法和美学话语等来把女性人体编码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则通过男性化的凝视、通过运用满足男性化目欲需要的视觉惯例来把男性观者和女性观者建构为不同类型的观看主体，让观者从中获得有关于自身的“知识”。再如在学校、工厂、购物中心这样的社会空间中，一方面通过空间的切割、通过空间中对象的命名来实施空间和对象的疆域化，另一方面又通过主体对空间和对象的“挪用”来完成空间对主体的召唤。

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把社会生产理解为对某一“产品”的制造，但在现下的语境中，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这里的“生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故而其“产品”不是现成品，而是一种效果，比如对象的意义、主体性的构成，以及主体、建制与对象的关系配置，它们都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效果在某一时刻呈现出来的。所以，福柯强调，对于建制的生产功能，我们应当做一种策略性的理解，即它所生产的对象及主体的“知识”并非对象和主体本身之所是，而是各方力量在场域中进行博弈和“商谈”的效果体现，

就像福柯在他的研讨班上说的：“对权力机制的分析的作用就是揭示知识的效果，它们通过在我们的社会中的斗争、对抗和战斗，以及作用斗争要素的权力策略生产出来。”^①

实际上，在福柯那里，装置或建制的运作总是与权力的生产和散播联系在一起。装置不是惰性的、无生命的机械集合，而是一种积极的、既寻求编码和殖民又寻求解放和突破的能量配置机制，德勒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福柯的权力装置理解为欲望配置：

在我看来，欲望装配表明欲望从来不是“自然的”规定性，也不是“自发的”规定性。例如封建制度是一种装配，它与动物（马）、土地、解疆域（骑士竞赛、十字军东征）、女人（骑士爱恋）等等建立了新型关系。一些装配完全疯狂，却往往在历史上是可确定的。至于我，我认为欲望在这种异质装配里和在这种“共生”中循环往复：欲望总是一个装配和另一个装配相结合，一种共同作用。当然，欲望装配将包含一些权力装置（例如封建权力），但应该把它们置于装配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之中。^②

装置是权力的生产、分配和享用机制，而权力的运作总是和欲望的运作联系在一起，装置、权力和欲望就这样构成了一个联动系统，它们基本上是一体的。所以，在福柯以及德勒兹的理解中，所谓装置就是权力装置和欲望装置，装置就是对权力的配置和对欲望的调节，而权力和欲望又是支撑装置的东西，三者之间并非固定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计算的博弈关系。

①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② 德勒兹：《欲望与快感》，于奇智译，《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

不妨通过三部作品——《疯癫与文明》(1964)^①、《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来具体看一下福柯在建制、视觉性和现代性之间进行的批判性链接。

如福柯自己所言，《疯癫与文明》要讨论的是古典时代以来疯癫的历史，但这不是病理学或医学意义上的疯癫史，而是至上的理性以其支配性的形式隔离、禁闭、定位、命名或“发明”疯癫的历史，是理性对疯癫进行消声、使其归于虚无和沉默的历史，所以福柯把对疯癫史的这一考察称为“沉默的考古学”。但这绝不意味着疯癫是有着确定本质的、居于理性之外部的对立面，相反，疯癫是理性的另一面，是理性内部的他者，或者说是理性依照排他逻辑从内部建立起来的一个异质性他者。疯癫的历史其实就是理性为确立自身而对疯癫进行排斥和消声的历史，所以疯癫陷于“沉默”的考古学就是理性走向“独白”的考古学，是自诩透明的理性对非理性的疯癫进行“理性把握”的考古学。

对疯癫的排斥和驱逐古已有之，福柯列举了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意象，同时也历数了那时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四处出没的疯癫意象，以强调疯癫在前古典时期的文化表征中被突显的诗性特质，因为在那时西方文化对疯癫的排斥尚未结构化，疯癫和理性还是平起平坐，它或是作为神圣的启示，或是作为嘲笑的对象，甚或是充当理性的对手，揭示着生命的奥秘和死亡的

① 该书原是福柯的博士论文，1961年首版时的题目为《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4年出节缩本时更名为《疯癫史》，1965年节缩本出英译本，题目为《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该书的中译版本众多，除较晚出版的完整本译本外，节缩本的两个译本皆自英译本转译而来。我下面依据的主要是北京三联版的节缩本译本：《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

真理。^①

可是到古典时期即 17 世纪，随着巴黎总医院这样的收容院、慈善堂和禁闭所的大量出现，疯癫者和游民、浪子、无家可归者一起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理性开始在征服疯癫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它再也不愿倾听疯癫的声音，也不允许疯癫发出声音，过不了多久，它根本就听不懂疯癫的声音了。

理性对癫狂的排斥和隔离是在两个方向进行结构化的：一方面在各种话语或陈述中通过命名、分类和区隔来完成对癫狂的“发明”和本质化，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空间中通过放逐、禁闭和展示来消解癫狂的力量。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立足于话语或陈述的编码功能，那后者就是在此之外还添加了建制的惩戒和规训功能，在那里，社会一方面通过收容机构的“大禁闭”来实现对癫狂的隔离和封锁，使其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癫狂的奇观式展示或展览来实现对它的彻底消声，让癫狂者的谵妄和歇斯底里天然的颠覆性落入无意义的空洞中。

福柯特别分析了收容院和禁闭所一类的机构对疯癫的处理的特殊意义。他指出，虽然收容机构将疯癫和其他游手好闲者等而视之地禁闭起来也是基于经济的、道德的、社会安全的和宗教的需要，如应对经济危机、培植工作伦理、掩盖社会丑闻、减少政治冲突、实施灵魂拯救等等，但对疯癫的历史而言，却意味着一个特别的社会位置的划定和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的到来。现在，人们从贫困、没

① 林志明在为完整本《疯癫史》中译本所写的长篇导言中指出，福柯的疯癫理论在此隐含了一个不假思索的盲点：“福柯在描述近代之前的欧洲中古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总会一方面过度凸显其差异性，另一方面带有某种美好的乡愁意味，仿佛那是一个不需再以历史问题意识处理的、接近堕落前夕的原初点”；所以福柯的考古学“虽然最后会在理论上放弃对起源的追求，但某种起源的化身仍会在描述过程中召唤起源幽灵式的回返”。（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译者导言：福柯 Double”，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0 页。）

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从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的角度来认识疯癫。现在，疯癫不再与无拘无束的想象和神秘的启示相关，也不再是人们善意的捉弄对象，而是被隔离，被禁闭，被逐出现实空间以外，“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①。

但另一方面，与其他被禁闭者受到的只是单纯的禁闭不同，古典时期对疯癫还有展示的习俗，那些受到禁闭的疯癫者常常被关在笼子里，向公众开放，成为参观和观看的对象。如果说对疯癫的禁闭是为了遗忘罪恶和掩盖丑闻，是为了让黑夜的永远留在黑夜，让不可见性永远归于不可见，那么，让疯癫隔着栅栏被展示和被参观就是为了使这个不可见性的威胁在可见中得到过滤。福柯说，在古典的疯癫话语中，疯癫者不是被视作病人，而是被视作动物，他们落入疯癫是人性堕落所致，是本当由理性来控制的兽性的爆发，现在，通过展示，通过疯癫者的表演，那兽性成为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疯癫变成了理性世界的一个纯粹景观。福柯分析说：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古典时期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

①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57—58页。

殊形态。……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①

在此，至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展示疯癫属于对付疯癫发作的安全制度的一部分。疯癫发作被视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但现在，随着曾经笼罩在非理性和疯癫身上的那种神圣启示的光环的消失，疯癫被抛入了一个庸常的世界，它的发作被人们从单纯兽性的角度来考虑，且这个兽性的价值与文艺复兴时期也大有不同，它不再是地狱权力的标志，不再具有标示另一个世界的价值，它成了一个纯粹否定性的事实，一个只与疯癫者自己相关的自然状态。在这一认识中，兽性即是疯癫的真相，所以“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②。正是古典时期的疯癫话语，正是这一话语与展示机制的结合，理性才得以在可见性中抵消不可见性的侵袭，才得以建立起自己在可见的王国的绝对治权。进而福柯还指出，也正是将疯癫和自然状态的兽性关联在一起，到现代时期，人们自然而然将疯癫引入医学领域来对兽性进行治愈，在那里，在精神病

①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63—64页。

②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67页。